

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毛泽东晚年外交生涯中浓墨重彩的大手笔，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乃至整个世界局势演变均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这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和直接参与者，基辛格先后5次受到毛泽东接见并深度交流。毛泽东强大的领袖魅力令基辛格极为叹服，印象深刻。自1971年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以来，基辛格访问中国近百次，为增进中美两国友谊和人民福祉作出历史性贡献，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美外交的常青树”。基辛格著述颇丰，他撰写的《论中国》《白宫岁月》等著作生动讲述了中国故事，成为近距离观察毛泽东和中国社会的“异域之窗”。

“具有独特的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普通民众眼中，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中国的真实情况如何？毛泽东有着怎样的性格和爱好？经过有色眼镜的层层过滤，在中美交往大门正式开启以前，这些问题对美国人民而言始终是雾里看花、不明究竟。带着这些疑惑，基辛格在1972年陪同尼克松总统踏上了访华的行程，首次见到了毛泽东。

令基辛格颇为惊讶的是，作为一位世界大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并不刻意追求物质上的享受，保持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习惯。在与毛泽东见面时，会客室内简单朴素的陈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四周书架上、桌子上、地面上都摆满书籍，房间角落里摆着一张简易木床，沙发上套着棕色布套。整个房间的陈设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面对远道而来的客人，毛泽东以强大的意志力克服了因疾病带来的行动不便的困扰。在基辛格眼中，毛泽东“具有独特的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他身材魁梧高大，脸上

常常微笑，眼神锐利，仿佛一眼就能识透人性的弱点和虚伪。当他一露面立即就会成为全场关注的焦点，他无需依靠过分的排场以显示威严，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同样令基辛格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别具一格的谈话方式。他的谈话完全脱离繁文缛节，让人感到轻松自如、富有哲理，往往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表达真意，间杂穿插几个玩笑活跃气氛，表面上看好像偏离主题，但始终聚焦中心问题。总的来看，毛泽东有着高超的谈话艺术，既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又收放自如，“指点了一个方向，但却不规定前进的道路”。

“顶尖的谋略家”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被动挨打的局面，难以在国际事务中替自己发声、捍卫自身权利。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基辛格十分感慨地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着比其实际力量更加强大的作用。”

在基辛格看来，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并将其作为制定外交政策时的经验来源，从中汲取灵感并发挥到极致。他善于唱“空城计”，出奇制胜，令对手摸不着头脑进而举止失措。他分析力量对比，掌握力量平衡，使敌对势力相互牵制，然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面对挑战时毛泽东敢于反击，但当形势不利于己时他会灵活地变换策略。毛泽东在外交中十分娴熟地借用传统手法，“立意大胆”，是“顶尖的谋略家”。

毛泽东处理具体的外交事务时从不固守刻板的礼节，善于以象征性的举动向对方传递明确信号。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登上天安门，几人的合影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对毛泽东这一做法蕴含的深

意，美国政府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错过了与中国接触的机会。后来基辛格不无遗憾地表示：“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毛泽东仍然高度关注国际局势并随时准备调整策略。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先后4次接见基辛格。1973年2月、11月，毛泽东与基辛格两次见面长谈，详细阐述了他对“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构想。基辛格认识到：“在政策执行上，毛泽东可以相当务实；在政策构想上，他总是努力抓住大原则。”1975年10月、12月，毛泽东与基辛格进行了最后两次谈话，尽管深受疾病困扰，但他仍显示出“无比坚定的意志力”，表达了“与一套复杂的战略意识相抗争的革命信念”。

“执着的自力更生理念”

在多次交往的过程中，基辛格强烈感受到毛泽东对独立自主立场的不懈追求，具有“执着的自力更生理念”。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告诉基辛格，面对外来侵略，“不论其他国家会怎么做，中国即是其军队必须撤至内地打游击战也要抵御外侮”，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歼灭敌人。

在中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基辛格感受到，在合作对话的每一阶段，中方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中国的行动自由与国家尊严”，“在何种情况下中国都不会仰赖其他国家的决定”。这方面有一个鲜明的例子。1973年11月访华结束前，基辛格提议可以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开通一条热线以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提议触碰到了毛泽东敏感的红线，引发他的激烈反应：“有人要借我一把手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在毛泽东看来，中美之间的合作是绝对平等

的，舍此立场便无合作可言。

面对外部核威胁，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将凭借自身的力量准备以“小米加步枪”抵抗到底。或许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和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基辛格起初对毛泽东的这一想法未能完全理解，但随着交往的加深，他最终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不乏克服他人无法想象的深重苦难，但最终仍以文化优势或幅员辽阔而使侵略者功亏一篑的事例。”

“将中国带进了一个新时代”

在基辛格眼中，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在于扫除了源自传统的牵绊，“将中国带进了一个新时代”，他是“自中国统一以来第一位奉行消灭旧势力、打破旧传统的执政者”。

毛泽东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和人情情怀，相信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无穷力量，认为只有依靠中国人民才能夺取事业的胜利。基辛格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理念影响极为深远。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成就依靠的正是“中国人民的坚忍和毅力，以及他们的耐力和凝聚力”。

此外，毛泽东重塑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中国追求现代化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他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国际舞台上挥斥方遒，在不同势力的此消彼长、动态演变中把握时机，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在冷战对抗的背景下毛泽东带领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进，“让中国参与到了一个个交汇错综的地缘政治圈中，却又不受其束缚”。

在基辛格的视野中，毛泽东是一位雄才大略、极为睿智的历史巨人，“毕生为彻底改变中国社会而努力奋斗”。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逆转了近代以来由盛转衰的趋势，恢复了昔日的大国地位与历史荣光，“逐步发展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兴强国”。（刘东庆）

毛泽东一生结交过不少国际友人，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斯诺越过国民党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区，对红色区域进行了为期4个多月的采访。在此期间，斯诺如愿见到了毛泽东，二人多次通宵促膝长谈。之后斯诺于1939年到延安再次访问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斯诺于1960—1970年间先后三次来华访问，每次都受到毛泽东接见。根据历次访问所搜集的一手材料，斯诺相继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书名为《西行漫记》）《为亚洲而战》《大河彼岸》等报告文学巨著，详细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情况，其中多次提到毛泽东，称他为“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因此，斯诺被誉为“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

俨然一个平常之人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长期难以被世界人民所了解。在苏区之行前，斯诺就在思考，作为南京国民党当局悬赏25万大洋通缉的头号“赤匪”，毛泽东那价值高昂的脑袋里有什么名堂？他是社会先知还是无知农民？他是否像某些国民党报纸描述的那样“残暴”？

带着这些疑问，斯诺来到陕北苏区，在保安（今陕西志丹县）首次见到传说中的毛泽东。乍一看，毛泽东面容瘦削、身材魁梧、鼻梁挺拔、颧骨突出，双目炯炯有神，还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副知识分子面孔。尽管南京国民党当局重金悬赏其首级，但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路人一起行走、谈话，毫不惹人介意在红色剧院的观众席间看戏，俨然一个平常之人。随着交往的深入，斯诺发现毛泽东喜欢憨笑，颇具幽默感，待人接物平易近人，有着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

在保安期间，斯诺还观察到毛泽东的生活和一般的红军战士几乎没有区别。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住在两间窑洞里，遍观洞内陈设，只有墙上挂着些地图，可谓家徒四壁、简陋至极。令斯诺感到震惊的是，毛泽东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没收地主、官僚等剥削阶级的财产，他和夫人的主要奢侈品竟是一顶蚊帐，自己只有一卷铺盖和两套布制服，佩戴的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

条红领巾，完全没有个人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排除美国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于1960年首次踏上新中国的土地，见到了阔别21年的毛泽东。此时，作为大国领袖的毛泽东身着一套黑灰色便装，脚穿一双已经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棉布袜子垂在足踝上，奉客和自用的餐食是家常便饭，他“仍然过着较为简单的生活”。

具有“知识分子素质”

斯诺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毛泽东具有“知识分子素质”。他在青年时期就热爱阅读，广泛涉猎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领域，“很多次长时间不在公众场所露面是为了独自进行学习和研究”，可以说学贯中西、通晓古今，是个卓有成就的学者。

毛泽东爱读历史故事。很小的时候，他就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还被尧舜、秦皇汉武等中国古代统治

学和政治等领域。当时，他对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高捷著作里的角色金美夫夫人（法国古代美人）的性格进行讽刺，使得一个法国访客大表诧异。因此，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的西方文学知识要比当时任何西方政治家的中国文学知识丰富得多。

“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斯诺认为，革命运动需要一个领袖在认识未来事物上比任何人都更有先见之明，毛泽东就具备这种能力。他曾对斯诺作出一些在当时看来非常荒谬的政治预言，最后却都实现了。所以，在斯诺印象中，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1936年斯诺到达保安初见毛泽东时，红军长征尚未完全结束，党又刚经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当时，“很少人相信共产党可以存在，更少有人预见到国共会缔结抗日联合战线”，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认为，日本

了”。但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预言坚信不疑。当然，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因素，准确描绘出了抗日战争的走向和中国革命的前景。

“教条比牛粪更没用”

斯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注重实际、深谙国情的反教条主义者，“对中国大地和在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远胜于同时代的任何政客”“比现世任何一国的元首更能了解自己的国家”。

令斯诺印象深刻的是，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热衷一种“农村漫游”式的远足。他会在暑假回家串户，靠帮工换饭吃，有时甚至行乞。随着年龄增长和革命实践的开展，他已经行程万里，足迹遍及中国农村。所以，不同于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贫苦农民早有了解，能够简单、准确地表达出他们的诉求，并发自内心热爱他们，把他们视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

在斯诺眼中，毛泽东还能写严肃的理论著述和文章，是“党内主要理论家”。但是，与一些言必称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的“留苏派”不同，毛泽东更了解中国形势，强调“教条比牛粪更没用”，要“从特别和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所以，他不认为会背诵马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们的“理论”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符合自身实际需要。对此，斯诺赞叹不已，认为这是“毛驾驭理论的本领”。

1960年，斯诺第三次见到毛泽东时观察到：他每年在北京的时间平均只有4个月，其余时间会按时到大城市视察，与各省领导甚至基层干部保持密切联系；也会突然到访各新工程区、公社、工厂、托儿所和幼儿园，和农民促膝谈心。他“要亲眼见到事物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对斯诺的每次采访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坦诚，斯诺也以毕生之力为毛泽东描摹出一幅立体而丰满的人物画像。在斯诺眼中，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党的领袖，而且更是一个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导师，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桂冠诗人，民族英雄，全民族的领导，以及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陈杰）

斯诺眼中的毛泽东

者的事迹所吸引，并发现这些故事歌颂的都是统治者，而无种田的农民。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将诗、传奇、古希腊故事和俄、美、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结合起来。

毛泽东热衷研究哲学。对于斯诺的采访，毛泽东非常重视，有时甚至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交谈。但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几本哲学新书，他便要求改期再谈，然后花了三四夜功夫心无旁骛地读完这几本书。当然，毛泽东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古希腊哲学家和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近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也在其关注之列。

毛泽东非常熟悉国际政治。他对英国工党的政策、美国新政和外交政策、种族问题都颇感兴趣，提出的一些问题甚至难倒了斯诺。他对麦克唐纳、罗斯福、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其他印度领袖都有研究。斯诺认为，毛泽东当时对欧洲社会和政治，乃至国际局势，都有实质性了解。毛泽东并不将其学习局限于历史、哲

一旦全面侵华，中国将迅速崩溃。

但是，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很快就会实现；中国无法速胜，也不会亡国，抗日战争“会出现持久斗争的局面”；国民党中部分人“将出卖中国，变成日本的工具”；战争结束时，革命力量将发展壮大，“成为亚洲东部的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将战胜日本，取得最终胜利。

1939年斯诺再次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对国际局势作出预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无关政治立场，只是军事需要，苏联不会成为德国的同盟；英国会牺牲中国利益绥靖日本，以避免双线作战的压力；当日本勒索到足够的绥靖，削弱英美在远东的地位，就会入侵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甚至进攻美国。

这些预言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比如，对于革命力量将壮大到占领口岸城市，斯诺“常常暗地里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对于英国绥靖日本，斯诺“断定他是估计错误